

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的历史进程

管彦忠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岁月里,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的历史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漫长的年代里,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省的很多居民,由于生活所迫或是怀着寻找新的出路的愿望,一批又一批离乡背井,漂洋过海,陆续到达中美洲的巴拿马地峡。在这 150 年中,曾多次出现过中国人向巴拿马移居的高潮。他们有过峥嵘的岁月,也留下了许多痛苦的记忆。

早在 19 世纪中叶,美国为了克服从东部穿越陆地到达西海岸的困难,决定在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距离较短的巴拿马地峡修筑一条铁路,并开始在世界各地招募劳工。根据英国政府的史料记载,1852 年有 300 名中国人被招募到巴拿马去当劳工。在漫长的海上航行途中,因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感染上疾病,有 72 名中国劳工丧生。第二年又有 425 名中国劳工乘船前往巴拿马,途中 96 人葬身大海,十分悲惨。

另据当时的巴拿马报纸报道,1854 年英国“威奇海”号船又载着 705 名来自广东汕头的中国劳工前往巴拿马。经过 61 天的艰难航程,701 人到达目的地时身体还能支撑下去,4 人变成了残废。这就是说,在前后 3 年的时间里,共有 1 262 名中国劳工远渡重洋,被运到巴拿马做工。根据巴拿马铁路局的统计资料,在修筑这条连接两大洋的铁路的过程中,又有 567 名中国劳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尸骨被埋在那条约 70 千米长的铁路沿线。只有约 700 名中国劳工大难不死,活了下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移居到秘鲁、古巴或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等地。

在这次移民潮中,中国劳工自杀人数之多也

引起了巴拿马和美国历史学家的关注。劳工们出国时都年轻力壮,为什么在航海途中和到达目的地以后要自寻短见呢?他们是用什么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根据历史学家的分析,许多中国劳工在航行途中染上了黄热病、麻疹、结核病、脚气病等,因得不到及时的医治,痛苦不堪,于是走上了轻生的路。到了巴拿马以后,有的人因为不懂当地的语言,无法与其他国家的劳工沟通而感到苦恼,实在想不通了就自尽。劳工的工作时间很长,受尽老板的残酷盘剥,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没有保证,待遇很差。有的劳工吃不饱饭,活活饿死。有的人因抽鸦片上了瘾,可是在当地又找不到这种毒品,精神上陷入极端痛苦的境地而不能自拔,于是选择了自杀的方式。一些中国劳工采取集体自杀的方式了却余生,以此反抗压迫。

在这个时期幸存下来的中国劳工,有的因工伤成了残疾人,生活没有着落;有些人被从牙买加雇来的黑人劳工取代,失去了工作。那时老板认为黑人劳工比中国劳工体质好,因而将一些中国劳工送到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里去干活,代替黑人。这些来自中国农村的劳工干起农活来比黑人强得多。从此也就开始了中国劳工流向一些加勒比国家的时期。

留在巴拿马的中国移民则开始转入其他行业。有的华人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成为企业主。有的华人生意没有做成,破产以后只好给老板打工,或是成为无业游民。在那个时期,巴拿马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措施,歧视中国移民,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使得一些中国劳工倾家荡产。与此同时,从事非法移民的交易使一些蛇头赚了大钱。但

是,为修筑巴拿马铁路出现的中国移民潮对后来经常性的移民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历史上第二次中国劳工移居巴拿马的高潮是在修建连接两大洋的巴拿马运河时期。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人开始在巴拿马修建运河,即在美国人修筑铁路30年以后。在这30年里,第一批到达巴拿马的中国移民已分散到巴拿马各地定居下来。在这一时期,无论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对巴拿马人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时期。政局不稳,经济衰退,直接影响到中国移民的生存。

19世纪70年代末,巴拿马东部与哥伦比亚交界的达连地区约有2000居民,居住在图依拉和丘古纳克谷地,他们主要是黑人奴隶、黑白混血种人、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混血种人及到巴拿马修筑铁路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等。许多中国劳工离开了美国的巴拿马运河公司,转而自己开商店或办其他企业。另外一些中国人继续到加勒比一些国家的甘蔗园或茶园里打工。中国劳工很勤劳,来自欧洲的雇主愿意雇他们。当时的哥伦比亚政府曾派人到中国,招募中国劳工到马格达莱纳地区干活。

从1889年到1990年这100多年的时期,是中国移民在巴拿马的生存逐步巩固并取得自己的地位的时期。1882年中国侨民在巴拿马的第一个侨团“威望”(音译Way-On)宣告成立,1904年改组为“中国慈善社”。这个中国侨民自己的协会除了开展侨胞之间的联谊活动和帮助有困难的侨胞之外,还集资购买土地,修建侨民的公墓并进行管理。在协会成员之间出现分歧时,他们强调和为贵,重视兄弟情,后来这些思想成了在巴拿马的中国侨民相处的座右铭。1896年中国侨民在巴拿马的第二个侨团“同顿”(音译Tung-Dong)宣告成立。

从19世纪80年代起,中国在巴拿马的侨民开始受到外交保护。1885年8月30日,中国清政府向哥伦比亚政府(当时巴拿马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递交照会,要求在巴拿马城和科隆市建立领事馆,以保护中国侨民的利益。哥伦比亚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当时住在这两座城市的中国侨民主要是经商,特别是经营杂货店,同时也做燃料生意。

法国人为开凿巴拿马运河成立的运河公司破产后,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当地人和外来的侨民都

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许多人因为无法继续生存下去而离开了巴拿马,到别的国家去谋生,一些中国侨民也离开了巴拿马。

在巴拿马经商的中国侨民主要跟当地社会下层的穷人打交道。眼见中国人做生意赚了钱,那些穷人开始仇视中国商人,以至公开举行反对华人的示威活动。1890年8月8日,当地巴拿马人提出了建立反对中国侨民的社会团体的要求,但被哥伦比亚政府拒绝了,因为哥伦比亚国家的法律允许中国移民在该国合法生存。

到19世纪末,生活在巴拿马的中国侨民大约有3000人。这是在近50年中不停顿地移民的结果,那个时期的哥伦比亚政府对外来移民没有限制。相反,因为修建铁路和运河工程,还需要招募大批廉价的劳动力。

1903年巴拿马在美国人的策动下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这个刚建立的中美洲小国立即与美国签署了修建巴拿马运河的不平等条约。从美国人接手修建运河时起,出现了又一次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的高潮。当时大批中国移民想到巴拿马定居,而巴拿马政府却对中国移民采取限制措施。

1904年3月11日,巴拿马政府颁布第6号法律,首次禁止“中国人、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移居巴拿马”。但这项法律不禁止过去到达巴拿马的移民,允许所有的中国侨民拥有自己的资产、农庄、牧场、商店和工厂及合法的职业,只是要求他们进行登记。这项法律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因为其背景是巴拿马人对中国移民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感到担心和害怕,认为中国人经商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

尽管负责修建巴拿马运河的美国工程师约翰·斯蒂文斯坚持雇用中国劳工,但美国和巴拿马的法律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美国运河当局采取了法律以外的一些不道德的措施,如提供假证人、冒名顶替、用地下方式运入劳工等办法,雇用中国劳工修建巴拿马运河。眼看用法律禁止中国移民没有产生效果,1906年2月6日,巴拿马政府颁布了第26号法律,允许所有那些想顶替已在巴拿马建立商店的中国人进入巴拿马。这就为中国人移居巴拿马开了方便之门。后来在巴拿马政府允许中国移民加入巴拿马国籍以后,到巴拿马的中国移民开始大量增加。许多中国移民将他们

在家乡的妻子、儿女接到巴拿马。当时的巴拿马政府官员(如外交部长莱维斯)就明确主张,允许中国移民,尤其是农民进入巴拿马。

1911年巴拿马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根据普查的结果,当时有中国人2 003人,日本人25人,其他国家的人31人。大多数中国人居住在巴拿马城、科隆市和牛口市。人口统计公报指出,由于受1904年法律的限制,很多中国人没有在当地注册,官方估计当时在巴拿马的中国移民约3 000人。实际上,当时在巴拿马定居的中国人多达7 000人。

在波拉斯总统执政期间,1913年3月24日颁布了关于中国移民和中国人、土耳其人、叙利亚人侨团的第50号法律。法律规定,所有1904年以后进入巴拿马和没有合法证件的中国人都应当注册,说明其以地下方式进入巴拿马采用的手段。对违反法律的人将同那些吸食鸦片、从事赌博和犯有罪行的人一样被遣送回国。这些法律上的限制,特别是强迫注册,遭到了那些有法律顾问的中国移民的反对。中国驻巴拿马的总领事也介入此事。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该总领事被取消了许可,这在巴拿马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于是在外交上由美国领事暂时照管中国侨民的事务。此事在巴拿马社会上引起广泛的争论。

1913年11月18日,中国侨民决定关闭其设在巴拿马城和科隆市的商店(包括批发店、零售店、洗染店、蔬菜销售点等),目的在于抗议巴拿马政府强迫中国侨民注册的法律。这一行动给那些在华侨商店赊账购货或每天到中国人开的商店购货的低收入的阶层带来不便。一些投机商趁机抬高食品价格。当地许多居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的法律。但到12月2日,中国侨民最后被说服了,他们开始到政府指定的地点登记。共有7 297名中国人注册,但不包括妇女。

1914年巴拿马运河工程结束并开始通航。不久发生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巴拿马再次进入经济衰退期。但中国人继续移居巴拿马。

在1941年阿努尔福·阿里亚斯总统第一次执政时期,巴拿马政府颁布了新宪法。这部宪法给已定居巴拿马的中国侨民带来新的问题。在宪法第二章关于外国国籍的第23条规定:“对外国移民通过法律进行控制,禁止下列移民:非本民族语

言的操卡斯特利亚语(即西班牙语)的黑种人、黄种人、印度族人、小亚细亚人和北非的移民。”从字面上说这项限制移民的法律与过去的法律差别不大,但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滥用职权侵犯侨民利益的事件,比如没收中国侨民的财产。这引起了巴拿马人,尤其是中国侨民的不满,他们纷纷谴责这部宪法的排华倾向。这种形势迫使许多中国侨民与巴拿马妇女通婚,然后将商店的所有权改到她们名下,以免经济上再受损失。这一通婚的过程对在巴拿马的中国人后代的成长起到重要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拿马的中国侨民已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中国侨民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也就是对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教育。他们长大后已不再只是经商,有许多人受到高等教育后,从事其他的自由职业,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大学教授等;有的人当上了国会议员,积极参与巴拿马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对巴拿马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提高了中国侨民在巴拿马的社会地位。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移民的数量有所下降,没有发生中国侨民与当地人的冲突。到70~80年代巴拿马军人执政后期,再次出现了新的中国移民潮。按照保守的估计,这一时期约有2万多中国人进入巴拿马。他们中有的人是持合法的证件入境的,也有一些人是持假证件或购买签证非法入境的。不少人是为了利用巴拿马作为跳板,到巴拿马呆一段时间后再寻找机会进入美国。

1982年巴拿马法官穆尼奥斯对报界称,有数千名在国外出生的中国孩子作为巴拿马人非法注册。当时只需要提供香港一家公证处的证明和一封巴拿马驻台湾“使馆”说明其父母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的信,就可以办理注册手续。这些证件是用中文写的,有的译成西班牙文,但没有任何合法性。那些人贩子从事中国移民和其他国家移民的交易可以赚大钱。在巴拿马军政府后期贩卖移民的交易有很大的发展。美国律师鲁比诺也卷入这种肮脏交易。他在1989年发布公告招收中国移民到巴拿马,承诺到达后可以马上为他们办理居留手续,称巴拿马气候炎热,生活费用低,有自由贸易区,

不需要现金投资,很容易从巴拿马进入美国,等等,因此使不少中国人上当受骗。

20世纪80年代末军政府垮台后,在新的民主时期巴拿马政府在移民问题上同样承袭了过去的做法。从1990年2月起,巴拿马报纸不断揭露从事中国移民和其他国家移民的非法交易的丑闻。当时的移民局局长、华裔郑道华指出:“在最近5年里贩运中国移民为被推翻的诺列加政权创造了2亿美元的收入。”从1985年到1989年有20537名中国人进入巴拿马,其中75%的人持假护照和身份证离开了巴拿马。同月,外国报纸揭露了一个国际上非法贩卖移民到美国和欧洲的网,在美国的亚拉巴马逮捕了从巴拿马去的63名中国移民。在巴拿马也有由中国人和巴拿马人合伙组成的黑社会团伙,他们负责提供伪造的证件和将移民通过墨西哥非法运入美国。同一时期,萨尔瓦多政府也逮捕了52名持假证件非法入境的中国人。近年来,一些中国人同意将他们送回国,另外一些非法移民则通过各种方法办理合法定居手续。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移民和繁衍生息,目前在巴拿马的华侨和华人估计有10多万人,在巴拿马250多万人口中这不算少数。根据华人社会学家拉蒙的研究,现在巴拿马的中国侨民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部分是早期来到巴拿马的中国移民的后代,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通过与巴拿马人的通婚,大多数人已融入当地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传统联系很少,不会讲中文,一般也不参加中国侨团举办的活动,他们分属于巴拿马社会的各个阶层。

另一部分虽然也是首批到达巴拿马的移民后代,但他们仍保留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和饮食习惯,重视家庭观念,等等。他们已不会说中文,也不会写中国字。许多人信仰天主教,是忠实的教徒,还有一些人则成了新教徒,他们希望教育自己的后代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不能忘记中国历史文化的根。

中国侨民的第三部分是近几十年来移居巴拿马的中国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是70~80年代到达巴拿马的,大部分来自广东省。这些新移民主要经营杂货店、肉店、家用电器及零配件商店、洗染店等。他们在中国受过教育,受到中国政治和文化

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表现不同于过去到达巴拿马的侨民。早期到达巴拿马的中国移民大多数是农民的后代,文化水平低,但很勤劳,给人的印象是守法和尊重当局。而这些新移民是在城市里长大和受教育的,他们在社会上采取更加进取的积极态度,做生意有进取精神。虽然他们分散在巴拿马各地,但仍能保持团结,保留着自己的习俗,很少参加传统侨团的活动。

那些基本上融入当地社会和尽量保留某些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侨民,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还拘泥于礼仪,比如为死者举行葬礼和悼念死者就是一例。每年农历9月15日中国移民要带着鲜花去扫墓,同时他们也纪念11月2日西方的“亡人节”。巴拿马有一个创建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公墓,但现在中国人会在任何一个公墓安葬死者和进行悼念活动。不论是中国人的“清明节”还是巴拿马人传统的“亡人节”,中国侨民都会很庄重地进行扫墓,献上花圈、食品、酒、纸做的衣服、纸钱、大米饭和茶水等供品,并请来乐队演奏相应的乐曲。

旅居巴拿马的中国侨民重视传统节日——春节。春节期间,全家吃年夜饭,燃放鞭炮焰火,祝贺家人和朋友新的一年走好运,财源茂盛。同时希望在爆竹声中赶走可能影响他们前途的鬼魂。一些侨民也过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菊花节等节日,但都不如春节那样隆重。中国侨民也积极参加当地人每年2月举办的狂欢节。节日期间,侨团要选出一位小姐作为“女王”,并装扮多姿多彩的花车参加当地人的花车游行。

许多巴拿马华侨不会写中国字,在家里也不讲中国话,这就间接地使他们的后代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与巴拿马人打成一片。也有一些华侨坚持教他们的孩子讲广东话,学写中国字,学习中国文化。一些中国侨民将子女送到中国人办的学校,更多的侨胞让子女上巴拿马学校,学习各种课程和接受西班牙语的教育。还有一些中国侨民将孩子送到泛美学校等用英语进行教学的学校读书,这在大西洋岸边的科隆市更为普遍。一些中国年轻侨民英语讲得比西班牙语或汉语还好。90年代初,在巴拿马有一所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那里除了讲授一般巴拿马学校的课程外,还教中文和中国文化和习俗的课程。(下转第60页)

革本身必然产生相应的社会代价。(第242页)为充分理解社会形势恶化的局面,作者拿出一章的篇幅(第八章)剖析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1“负债增长”战略的失误引起“借债规模失控”和“债务结构的不合理”;并“助长了金融投机”、“私人债务的‘国家化’”和“资金投向的不合理”;(第243~247页)2“经济形势的逆转是导致社会形势恶化的基本原因”,使经济调整处于被动状态;重新安排债务的条件苛刻,也使财政危机成为债务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外贸部门不堪重负”;(第250~254页)3经济调整和改革的负面影响,例如,改革导致社会公正的倒退以及设计改革政策和实施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第259~260页)通过这种分析方式,作者层层剥开笼罩在社会贫困化现象上的疑团,澄清了问题的本质原因。

作者在结束语中提出,拉美社会问题不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且在选择发展模式上存在一定的失误,经济指导思想的偏差使对某些重大关系的处理失当,这就要求选择兼顾社会公平发展

的发展模式,并需要有一个有创造性、充满活力、精干而高效的政府,充分发挥国家同贫困作斗争的作用。

总的来说,作者选择的研究角度新,观点新,论述充分。另外,在论述中注意吸收国内学者的学术成果,并参考和引用了国外学术界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量著作和资料,让读者充分了解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同时,作者“用事实说话”,在书中运用了36个资料统计表来分析问题,充分体现治学严谨、资料翔实、论据充分的特点。

依笔者看来,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一,既然是讨论发展模式和社会冲突的互动关系,在书的体例分配上,发展模式笔墨较少,显得有点单薄;其二,关于拉美工业化,作者的主张是“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 (第8页)这种说法是否有商榷的余地?而有一种观点认为,1870~1914年可以看作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第4卷,第45页)。当然,瑕不掩瑜。笔者认为,该书是作者为拉美社会问题研究奉上的一部成功之作。

(上接第35页)

从20世纪50年代起,巴拿马出现了两份中文报刊《共和国报》和《正义报》,是杂志型的,印刷方法比较原始,但为侨胞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在此之前,还创办过一种手抄的小报,综合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有关中国内战的消息。此后还出版过《新世纪》《龙》等刊物。目前巴拿马有两份中文报纸——《拉美快报》和《侨声

报》,综合报道世界上的重大新闻和来自中国和港台的消息。

旅居巴拿马的中国移民世代勤劳,爱好和平。一个半世纪以来,他们在大洋彼岸为巴拿马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增进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 高 川)